

沈阳党史 2010 年合订本

(总第 79—84 期)

《沈阳党史》编辑部

沈阳党史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沈阳市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遗址普查势在必行

沈阳
党史



2010年第01期

沈阳市召开 党史工作会议

2010年1月26日，沈阳市召开2010年党史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鲁颖主持，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研室主任赵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党研室副主任鲁颖总结了2009年全市党史工作情况，部署了2010年全市党史工作任务。

赵阳在讲话中首先对2009年全市党史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全市党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指出，党史研究工作要关注现实，为市委的中心工作服务，充分发挥党史“以史为鉴、以史资政”的作用。提出做好党史工作要解决好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作理念的问题。要增强机遇意识，培养系统思考的工作理念；二是工作环境的问题。要注意工作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双重建设；三是工作水平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会上对2008—2009年度全市党史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全市各区、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化茧成蝶 飞得更美

●江山

二月的沈阳,没有一丝春的气息,一片银装素裹,天寒地冻。

《沈阳党史》杂志的编辑们,面对2010年第一期清样,却有着墨香不是花香,墨香胜似花香的感觉。杂志比作花,二月春来早。

《沈阳党史》作为沈阳唯一的党史期刊,既是宣传党史工作成果、了解党史大事要事的平台,也是交流党史工作经验,展示党史工作者良好风貌的视窗。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2010年的《沈阳党史》当然也是新的,从封面到内文、从内容到形式。封面紧贴刊物的策划主题,突出设计与创意元素;封底独辟“沈城瞬间”,与我市知名摄影家合作,用美图诱惑眼睛。刊物内文力求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在组稿上,强调策划性;在编辑上,突出整体性。在地方党史方面,注重权威性;在工作动态方面,加强指导性。每个稿件,要具有文学性;整个杂志,要提高可读性。突破和创新,是我们进步的必然选择。

昨天对比前天,是新的;今天对比昨天也是新的。《沈阳党史》期刊就是在新与旧的轮回里不断前行,期复一期、年复一年,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更不是回到原点的一键恢复,是系统的主动更新、是编辑们的自我升华。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尽力了,我们付出了,无论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怨无悔。

2009年渐行渐远,2010年又给了我们一个冬去春来的轮回,愿《沈阳党史》能够化茧成蝶,飞得更美!





P4 [本刊策划]

主编 赵阳 鲁颖
执行主编 李振熹 钱樾雷
执行副主编 江霞
编辑 栗莉 丁婷

主办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沈阳市中共党史学会

编辑出版 沈阳党史编辑部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50 号
电话 024 22845850
邮编 110014
E-mail ds-shenyang@163.com
出版日期 辽宁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0106 号
2010 年 2 月 10 日

封面 遗址普查 势在必行
封二 沈阳市召开党史工作会议
封三 沈阳史迹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封底 沈城瞬间
彩灯迎春



遗址普查 势在必行

本刊编辑部 4

保护好革命遗址 提升沈阳的软实力

——对沈阳革命遗址现状的分析与保护利用的建议

齐守成 5

保护利用好革命遗址
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邢安臣 8

江西摸清红色资源“家底”：
确认革命遗址 2423 处等

9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化茧成蝶 飞得更美

江山 1

往事

珍藏记忆

毛泽东和他的三位著名秘书 姚远 10

董健吾护送斯诺等进陕北 刘肃勇 12

往事漫忆

“开国第一宴” 王凡 东平 14

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

毛泽东手一挥“扫了它” 刘庆功 16

史海撷英

黄埔军校走出的女军官 夏农 18

名人子女笔下的继父(母) 黄团元 20

保家卫国

云山之战: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何勃 22

志愿军阵地上的“风语者”

虹在志愿军师宣传科当《战斗》报编辑的经历 马荆育 24



人物

人物春秋

问苍莽大地,数风流人物

——管窥毛泽东对古代人物的评价 卢志丹 26

英雄儿女

“一箭双雕”闯沈阳

——记陈赓与“龙潭三杰”联袂对沈阳的一次情报活动 木雨 28

时代英模

沈阳因感动而温暖

——记 2009 年度“感动沈阳”人物评选活动 沈文明 30

视野

工作论谈

对编写大事记工作的几点思考 郭宇 32

借势而为 注重实效

——浅谈 2009 年开展党史宣传教育活动的体会 33

信息快递

沈阳市委党研室表彰

2008—2009 年度党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 34

文摘书苑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的春节足迹 莉莉 36

红军长征为何未中过埋伏 仲欣 38

编读往来

读者之声 48

史料

帅府专栏

帅府览四绝 漫步话石雕 高灵灵 40

古城风云

暗战——方涛军事情报小组谍战沈阳 黎明 42

没有罪证的“囚徒”

——记任国桢、杨志云在奉天第一监狱 白文升 44

名人旧居

发生在于珍公馆的故事 刘振超 46

遗址普查 势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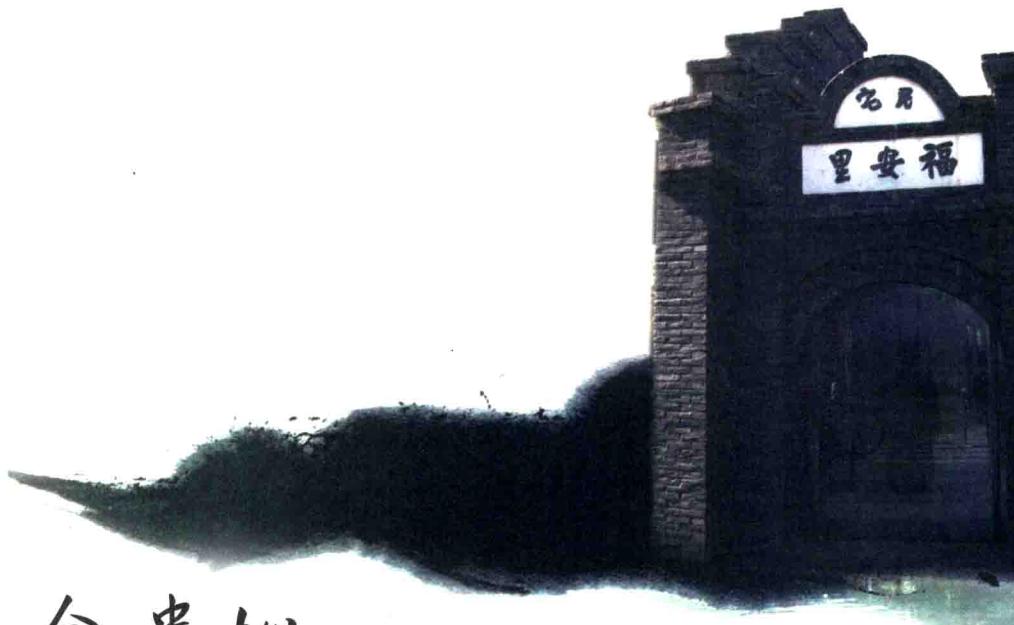
本刊编辑部

飞雪迎春，春回大地。当新的一年新春到来之际，“本刊策划”又如约和读者朋友见面了。您一定会发现栏目策划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变化！新的一年，“本刊策划”栏目将秉承《沈阳党史》期刊的求新求变主旨，为读者朋友奉献更多精彩！

根据中央、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部署，今年沈阳要在全市范围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是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认真挖掘、整理和研究党史资料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全面掌握我市革命遗址的基本情况和生存状态，不仅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宣传教育的开展，还将为准确判断革命遗址保护形势、科学制定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政策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加大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的力度，从而，大力发展战略性先进文化，积极推进沈阳的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提升沈阳的软实力，确保沈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为了做好革命遗址普查，引发全社会都来关注这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事。本期我们特别策划了以革命遗址普查、保护、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本刊策划”，约请两位对我市革命遗址颇为熟悉的专家来研讨相关话题。

日本投降后，沈阳人民欢腾雀跃，纷纷上街庆祝。1945年9月18日，星期五，清晨六时三十分，沈阳人民在北陵公园欢庆胜利，迎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不抵抗军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身上，高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保护好革命遗址 提升沈阳的软实力

——对沈阳革命遗址现状的分析与保护利用的建议

●齐守成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充分保护和开发利用革命遗址,使之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正在致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沈阳来说,不但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且是一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重要事情。

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的意义

沈阳是一座具有 7200 年历史的名城,还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英雄城市。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党就在沈阳传播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沈阳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沈阳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志士,同时也给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迹遗址。这些革命遗迹遗址,记录着党领导沈阳人民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沈阳人民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忠于信仰、无私无畏、英勇不屈、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铭刻着革命先辈为沈阳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业绩。这些革命遗迹遗址是沈

阳独特的文化遗存,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也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

更好地保护、开发利用沈阳的革命遗迹遗址,为全市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众多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的重要场所和平台,对于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服务沈阳、辽宁乃至全国的红色旅游,提升沈阳的软实力,促进沈阳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打造全国一流的历史文化名城,全面振兴沈阳老工业基地,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沈阳革命遗迹遗址保护的现状

依笔者多年参与市有关部门历史遗址的实地调查，和笔者积累和掌握的我市一些革命遗迹遗址资料，试对我市革命遗迹遗址的保护情况作以粗浅的分析。

从目前我市革命遗迹遗址保护状况看，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保护、开发利用比较好的革命遗迹遗址。主要表现为原址保持较好，列入政府文物保护范围，有专职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有正常的财政经费维护遗址建筑物，硬件设施完善，对公众开放，正在发挥以史育人的社会功能。

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秘密办事机关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省市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沈阳市党史教育基地。其原址一栋6间硬山式青砖瓦房及“民宅福安里”门楼等均保存完好，现正式对外开放。因刘少奇革命活动旧址原址拆迁，经市政府决定，按原貌易地重建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发挥旧址的教育作用，1986年市政府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2003年，满委旧址进行了扩建，整体形象有了全新的改观，占地面积达到了2,500平方米，丰富了展览陈列内容，塑造了满委领导的群体雕像，开辟了宣誓广场。

这两处重要的革命遗址，先后接待了中央及省市的领导，和曾在满委工作过的的老同志及亲属，每逢党的诞辰，均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来旧址参观，并举行入党宣誓等仪式，许多市民群众、中小学生、外地游客都会自发来到这里，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一处居民楼中的陈云旧居陈列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1948年11月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的居住地。该馆是典型的日式建筑，保存完好，原为省里一单位使用，后归省委党史部门管理，经省财政拨款修缮，辟为供人参观的陈列

馆，馆内按当年陈设摆放，并展出了征集来的当年文物。每年都有领导和群众来此参观，追忆伟人，受到教育和启迪。

另如曾见证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少年学习生活和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的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曾是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时期的政治中心，东北易帜、杨常事件、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等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决策和发生地的张氏帅府博物馆、边业银行（现为金融博物馆）；以及“九一八”博物馆、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东北解放纪念碑等重要革命遗址，均保存完好。

第二种情况：保护、开发利用不到位的革命遗迹遗址。现原址尚存在，有的也列入文物保护范围，但没有很好地维护、开发利用，挪作他用，没有发挥遗址的应有功能。如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旧址，该原址属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00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革命遗址是上世纪20年代，沈阳最早的党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活动场所。沈阳解放后，此处由公安机关占用，后又交市基督教会管理，如今原址的建筑物保持尚好，虽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门前没有任何保护标识，而原址内也没有革命遗址的陈列物，更没有恢复本来的面貌。

第一届中共奉天特支旧址（老精华眼镜店），该革命遗址处于今和平区太原街北路口，建筑物已破旧不堪，面临拆迁。

老一代革命家车向忱旧址，门前曾挂有不可移动文物标志，系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和平区曾为此拨款维修，但由于其产权属铁路系统，至今未加以保护利用。

第三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的革命遗迹遗址。只闻其名其事，未见其物。据史料记载，一些确有其名并有过革命活动的革命遗址因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损毁了、湮灭了。如静远学馆（早期党在沈阳的活动地）、大德生药房（中共满委通讯站）、绿野书店（中共满委联络站）、中共满委奉天区委机关旧址等诸多革命遗址。为数不少的革命遗迹遗址，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标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和值得反思的。



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的建议

针对上述对沈阳革命遗迹遗址现状的分析，尤其是第二、三种革命遗迹遗址的现状，笔者对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好我市的革命遗迹遗址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管窥之见，权作抛“砖”。

第一，保护革命遗址要纳入法制轨道。要将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的内容列入地方法律法规，做到保护革命遗址有法可依，引导全社会增强保护革命遗迹遗址的法律意识。

第二，沈阳的革命遗迹遗址的保护、开发利用，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地方财政给予一定的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主管遗迹遗址的党政部门及其他有关涉及到革命遗迹遗址的单位要形成共识，增强责任感，识大体、顾大局，协调一致，积极行动起来，对于一些能确定为革命遗址的地方，无论存在与否，先设立一个标志物，写明该革命遗址名称及遗址的简介。

第三，沈阳现有的革命遗址，如中共满洲省委旧址、陈云旧居、张氏帅府等一些纪念馆、博物馆，大多为专一性的展馆，而在沈阳革命历史中，还有许多革命活动基地并不能容其中，尤其是已经损毁的革命遗迹遗址，为能充分展示党在沈阳的辉煌历

程和党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建立沈阳党史博物馆十分必要，至于该馆设专馆或附属别馆，可进行研究。

第四，沈阳的革命遗迹遗址应规划红色旅游线路，做出一份红色旅游线路图。党史部门与文物、旅游等单位协调，形成一条沈阳的红色旅游景点线，使人们在游览革命遗址、观景睹物的同时，受到革命传统和党史教育，激发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

第五，将普查的革命遗迹遗址图文资料汇总成书，全面系统地编辑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权威的革命遗迹遗址出版物，为全市人民提供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以上是笔者对沈阳革命遗址现状不全面、不周详的分析，和几点不成熟的建议，恐有以偏概全之处。相信随着全市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的深入展开，将会有更多的革命遗址得到发掘考证和保护利用，让我们热烈地期待着！

（作者系辽宁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保护利用好革命遗址 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邢安臣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闻名全国的历史文化之城，京气之旺，霞蔚之关，历史文化底蕴积淀厚重。前些年，我参加了市有关部门组织的 60 余处历史（革命）遗址调查考证，使我体会最深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革命遗迹遗址、名人故居等破坏损毁惨重。因此，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抢救革命历史遗产，确实是当务之急！

中央党史部门提出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十分及时，非常必要，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通过普查，摸清我市革命遗迹遗址的底数，并很好地加以保护利用，这对人们学习党的历史，牢记党的历史，传承光荣革命传统，研究并探寻革命遗址的重大历史价值，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依据我多年参与历史（革命）遗址调查考证的经历，现就我市革命遗址普查、保护、开发与利用谈几点看法，一己之见，不足为道。

第一，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除了坚持属地原则，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外，还应充分发挥档案部门、文物管理部门、民政部门、武装部、驻军和老同志的作用，寻找历史见证人、知情人。如专访老领导老将军老战士，专访重要战役战斗的历史见证人及相关区县的民政、武装部等单位。

第二，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应重视查阅历史档案，查阅相关的革命文献史料、回忆录，必要时，请专家学者帮助提供普查线索。使普查工作做到一不漏查、二有佐证、三有深度。如查阅《沈阳近代史建筑》、《沈阳史迹图说》、《东北抗战实录》、《沈阳解放》、《1904—1948 岁月东北》、《东北解放战争图志》、《辽宁城市解放档案文献图集》等书籍，会对普查有所帮助。

第三，党史研究部门应会同文物部门，对普查的革命遗址、名人故居等分门别类地登记造册。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对普查出来的革命遗址、名人故居等进行论证，以档案和现存的遗址资料为主要依据，认真严肃的考查印证，力求准确无误。

第四，普查后确定的革命遗址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依法严加保护，科学地开发利用。避免类似奉天第一监狱这个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等诸多共产党人开展狱中斗争的遗址被损毁现象的发生。

第五，保护好革命历史遗址，一定要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

尤其要倾听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几年前在保留与拆除代表民主革命时期沈阳民族工业的标志性建筑——肇新窑业公司办公楼遗址时，经过市政协委员和文史顾问们的不懈努力，再三呼吁，市领导采纳了政协委员和文史顾问的建议，使得这座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标志性建筑得到保护。

第六，对革命历史遗址的开发要有深度、利用要有广度。我去南方参观考察，发现人家对自己家乡的革命遗址，特别是党领导人民打天下的革命遗址，无论是开发的深度、还是利用的广度特别好。像赣南、闽西等老革命根据地历史旧址都充分地开发利用起来，而我们与人家比，在观念意识、以至行动上都有差距。我们需要挖掘的东西很多，如中共沈阳市第一个党支部旧址在哪？东北民主联军曾克林部队进驻沈阳时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等等，都没有发掘出来。对关向应、车向忱等旧居，东北较早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小组“星期三会”的奉天基督教会等革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利用，要认真加以研究。

第七，利用革命遗址是身临其境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的一种形式。我曾参与了辽宁省政协学宣文史委员会义勇军战斗遗址的考查，还参与过沈阳市政协学宣文史委员对沈阳历史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的调研考证。从调研考证的实践活动中，我切身体会到，挖掘、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形象与品位，可以打造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将静态的不可移动的革命遗址，开发利用为生动形象、真实而又具有现场感的活的历史参照物，使其发挥以史育人的重要功能。在我 35 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活动中，组织学生到沈阳革命遗址、名人故居进行现场教学，效果特别好。推而广之，这是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保护、开发利用革命遗址。保护开发的深一点，利用的好一点，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的教育作用，把党的光荣革命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好！

（作者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顾问）

相关链接：

江西摸清红色资源“家底”：确认革命遗址 2423 处

据 2009 年 11 月 14 日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上公布的消息：经过近 1 年的努力，江西省党史工作者已摸清全省红色资源“家底”，确认革命遗址共有 2423 处。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共和国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江西省十分重视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和利用工作。进入新世纪后，江西省开始建立红色旅游区，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发展红色旅游的省份。自 2005 年开始，江西省已连续举办 5 届“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2008 年，江西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次数达到 3543.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36%，红色旅游总收入

244.6 亿元，同比增长 29.93%。

据介绍，江西省今年普查到的革命遗址 2423 处，较 1991 年普查到的 1258 处增加了近一倍。革命遗址数量的大幅增长，原因是普查方法更加科学，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展开革命遗址普查，不仅把党的重要机构旧址及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重要的党史事件、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事迹发生地等各种遗迹都列入了普查内容，而且还把对巩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启迪意义的遗址也纳入了普查内容。此外，一些已损毁的重大遗址、遗迹也成为普查对象。

来源：《中国网》

浙江拨 700 万专项资金用于普查与革命遗址保护工程

2008 年 8 月，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全省党史胜迹（即遗址，下同）普查工作会议”，对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认真贯彻省委指示精神，要求各地按照“全面普查、掌握现状、加强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明确了普查范围、内容、方法。从而正式启动了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

2008 年 11 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通过财政给各市、县（区）党史研究室拨发了党史胜迹普查的工作经费总计 209.5 万元，确保了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党史胜迹普查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了调研组对杭州、绍兴、湖州、金华等市县进行了党史胜迹情况调

研。2009 年 10 月，经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胜迹普查领导小组审议，确定给全省 46 个党史胜迹项目下拨专项保护资金 490.5 万元。

到 2009 年 5 月底，《红色印记——浙江省党史胜迹图志》各市的资料上报工作完成。经过省、市、县共同努力，基本摸清全省党史胜迹家底。据统计：全省党史胜迹 1615 处，其中民主革命时期 1348 处，社会主义时期 139 处，著名党史人物纪念地 238 处，综合性纪念场馆 164 处。全省被授予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 511 个，其中国家级 23 个，省级 86 个。

来源：《台州机关党建》网

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贵阳已确定 60 余处革命遗址

根据中央在 2004 年下发《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及贵州省红色旅游规划项目的要求，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所属区域内的革命纪念地、党史遗址遗迹进行了深入调查，目前基本可以确定贵阳市的红色旅游景点有 60 余处。1982 年以来，在省委市委的关心和支持下，大多数已被国家和省、市、区（县）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已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著名的息烽集中营 1988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达德学校、森林公园国际援华医疗队旧

址、修文阳明洞等 9 处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贵州历史上第一位省工委书记林青就义地等 12 个革命纪念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红军长征足迹遍布贵阳各个郊县，有 20 余处红军长征遗址正在申请列保，同时党史研究室还与各区县（市）联合，为中国共产党在贵阳民主革命时期留下的革命遗址、遗迹的开发保护和利用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研，为促进贵阳市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应尽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来源：《贵阳党史》2009 年第 3、4 期

毛泽东和他的三位著名秘书

● 姚远

毛泽东的一生有过很多秘书，因其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他的秘书必须是高水平的。其中像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等几个主要秘书都是他亲自发现和挑选的。



毛泽东

赏识有学问有思想的人



毛泽东与胡乔木

毛泽东一向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用秘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必须“有学问”，要有真才实学。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几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在《中国青年》上看到的胡乔木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文章，他被文中的才气深深吸引，发现“乔木是个人才”，点名要胡乔木当自己的秘书。

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研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胡乔木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 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语辞肯定地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

由此可见，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新闻首脑”。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得益于陈伯达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

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争论，陈伯达颇有见地的一席论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陈伯达刚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十分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陈伯达作陪。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由于 1942 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

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好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此后不久，毛泽东把田家英调来当长子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来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很满意，正式调田家英任自己的秘书。

希望秘书们博览群书，兴趣高雅

毛泽东喜欢吟诗书法，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能经常与之交流。

因此，受毛泽东的熏陶，他的秘书们都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

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嗜好。在上世纪 60 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离开毛泽东多年，在休养期间，胡乔木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每次习作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忙中偷闲，对胡乔木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往来不断。

正如胡乔木所说：“《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江青的极大不悦。江青曾当面斥责过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经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也正是当时毛泽东思索的

热点。上世纪 30 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经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

毛泽东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 29 岁，如同子辈，但田家英喜欢文史，同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读了好书，都要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纪的沟壑，相互切磋，亲密无间。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

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家英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书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与田家英

看重人品，喜欢老实人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老实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大都老实、勤恳。

胡乔木第一次被毛泽东批评，是因为胡乔木起草的 195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

陈云当时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并请转告毛泽东，胡乔木没有听陈云的建议，据实将“跃进指标”写入公报。事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第一次用颇为尖锐的言辞批评了胡乔木。

毛泽东说胡乔木是一个信得过的老实人，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句话非常传神，也说明毛泽东对人的诚实是看得很重。

陈伯达与毛泽东第一次发生不愉快，是在 1949 年随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一次，在与斯大林会谈时，陈伯达因斯大林对自己的问话而忘乎所以，表现力十足，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

之后，陈伯达又不打招呼，私自搬到外面住宿。毛泽东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你为什么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

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后，虽仍然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从此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

上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曾批评陈伯达：“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可见，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油滑心态有着很深刻的洞察和鄙弃。



董健吾

护送斯诺等进陕北

● 刘肃勇

宋庆龄巧安排



董健吾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爱国进步青年冲破艰难险阻，纷纷奔向那里。此时，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甚至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和谩骂，在中国及至世界各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

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局，决定邀请外国记者访问陕北苏区，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在国际事务的代言人宋庆龄女士写信，请她帮助物色人选。

1936年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专程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女士，表示要到陕北苏区访问。宋庆龄接受了这位异国朋友的热情求助，通过设在外国友人艾黎处的秘密电台转达给陕北。毛泽东作出决策，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作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改进根据地的医疗水平。5月中旬，宋庆龄把埃德加·斯诺约到上海自己的住所，向他转达了中共欢迎他去陕北的喜讯，告诉他回北平接到中共的介绍信后即可出发，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等候姓王的牧师前来接头。

埃德加·斯裔回北平后约半月，就收

到了北平地下党徐冰送来的介绍信。那是经宋庆龄联络，由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用隐形墨水开出的。1936年6月3日深夜，埃德加·斯诺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他记者生涯中神秘的“红色中国”之行。按宋庆龄的叮嘱，斯诺到郑州下车，与美国同乡马海德医生会面，然后两人换乘直达西安的火车，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乘火车自上海赶赴西安。董健吾，上海市青浦县人，1891年生于富裕的书香人家。1911年，本是中学足球运动员的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理科，4年后进入圣约翰神学院进修，1917年即以理科与神学双学士毕业，从而成为基督教职业牧师。在西北军中任专职传教牧师时，经中共地下党人刘伯坚与浦化人的介绍，于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董奉令回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董健吾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著名牧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便于同斯诺接触，董健吾改姓王，

名叫王楚基，对外称“王牧师”。因董健吾不认识斯诺，宋庆龄很巧妙地设计了两人见面时的联络信号。除接头的暗语外，

宋庆龄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下两句英文诗，盖上骑缝章后，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

张学良助出城

1936年6月初，董健吾来到西安，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在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记册上，董健吾很方便地查到了斯诺和马海德的住房。他先用暗语相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也用预定的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然后双方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两人顺利接上关系。

第二天，董健吾拜会张学良将军，告知经宋庆龄推荐、中共邀请的两位外国朋友现已到达西安，请求张将军指派座机将二人安全送往陕北苏区。张学良听后，停顿了一会儿说：“以前我几次指派我的专机送中共要人或进步人士去陕北，都没有问题，因为都是中国人。这次是绝对不可以了，因为驾驶我专机的是美国飞行员，将两个外国人送往苏区，而又没有乘飞机返回来，肯定会引起飞行员的好奇，及至怀疑，弄不好会走漏机密的。容我想出个万全的办法，另行安排，请稍等些时日。”

几天后，张学良派来的东北军副官在“王牧师”的陪同下，来到斯诺和马海

德居住的房间，说：“咱们去西安郊外的汉朝未央宫遗址，随便浏览放松一下吧，那里很好玩。”斯诺欣然同意，一行人来到车前，打开车门，但见副驾驶座位上坐着一位戴着墨镜，身穿华贵中山装的人，见有人来，此人未开口说话。

车行至未央宫遗址，几人步行至一处无人的山坡，那位神秘人摘下墨镜，主动开口对斯诺说：“我是邓发。”斯诺走上前握住邓发的手，不住地说：“幸会，太幸会了。”斯诺听说过邓发，知道他英勇无畏，蒋介石多次登报悬赏五万大洋要邓发的脑袋，邓发本人却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更从来都不把敌特放在眼里。

邓发与斯诺、马海德并肩散步交谈，邓发亲切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对两位国际朋友不辞辛苦、不畏艰难前往陕北苏区，表示热情欢迎和诚挚慰问。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全力襄助，现在我已同‘王牧师’商谈好行动计划，不久即可平安到达苏区，在那里你们将会受到党中央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两天后，“王牧师”乘坐张学良指派

的豪华轿车，从西京招待所接出整装待发的斯诺和马海德。轿车快速地向西安城北郊外开去，一路上，凭借张学良签发的西北



马海德

“剿总”司令部开具的特别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哨卡。车行许久，来到了西安城外的一处郊野停了下来。远处停着一辆军用卡车。三人走近卡车，“王牧师”开口说：“几天来相处已成为好朋友了，我护送二位到此就再会了，就请二位改乘这辆卡车前往陕北吧，祝福你们一路平安。”斯诺、马海德与“王牧师”长时间拥抱告别，互致珍重好运。“王牧师”站在原处，目送卡车渐渐远去。直到这时，斯诺与马海德也不知道“王牧师”的真实姓名。

安全抵达陕北

一个星期后，斯诺与马海德安全抵达陕北安塞百家坪，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隆重欢迎。随后，斯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你可以去到苏区各个地方参观访问，上至红军司令员，下至红军战士，以及苏区公教人员和平民百姓，都可以采访，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马海德医生在到达陕北后，即奔赴抗日前线为红军指战员治病疗伤。斯诺

则开始了他在陕北的采访工作。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书中首次向西方世界公正地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红色中国。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

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几十年后，斯诺数度访问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但毛泽东却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后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即董健吾。



如今的北京饭店

“开国第一宴”

●王凡 东平

1949年10月1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就在这天下午3时，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才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同时进行了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而夜幕降临后，华灯初上之时，新中国的领袖、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的代表共600多人，又聚集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庆祝贺。

世界上的著名饭店不少，而能在开国之际举办开国大宴的并不多。对北京饭店来说，举办如此隆重的大型中餐国宴也是头一回。

为了筹办这次开国第一宴，最忙碌的人，就数刚刚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了。他原是冯玉祥军中的随军牧师，30年代主张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内战遭国民党囚禁，经中共地下党大力营救才出狱。他非常熟悉礼宾的仪规，而且对北京饮食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哪几位名厨，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因此，这史无前例的盛会就由余心清亲自统领操办。

北京饭店虽说是京城第一名饭店。但以往为适应洋人口味，多经营西餐，以法式大餐最为有名。只

是在1947年国共合作军事调停谈判时期，中共代表团常驻北京，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当时的北京饭店经理曾从泰丰楼饭庄请来几位厨师，专为中共代表做中餐。而现在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中餐宴会，仅凭北京饭店一己之力是难以承担的。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有“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从哪里入手操办国宴呢？余心清和当时北京饭店经理王韧、副经理沈平多次商议后决定，先引淮扬菜系入北京饭店，因淮扬菜口味适中，菜肴面点皆全，南北方人都易于接受。



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